



文本的多维视角分析 与文学翻译

● 赵 红 著



文本的多维视角分析与文学翻译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汉译研究

● 赵 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本的多维视角分析与文学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的汉译研究 / 赵红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309-06041-6

I. 文… II. 赵… III. ①叙事诗—翻译—俄罗斯—近代
②俄语—翻译—研究—中国 IV. I046 H3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0309 号

文本的多维视角分析与文学翻译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汉译研究
赵红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 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041 - 6 / I · 436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新鲜的声音

这本书是译本的结构分析,看起来属翻译学的问题,我倒宁愿说它是跨学科的研究,甚至不反对叫它中俄文化交流的课题。

普希金在俄国的诗圣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他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思想的博大和艺术的精湛来说,不仅为俄诗的绝唱,也是俄罗斯整个文化的巅峰。其人其诗,在上个世纪的中国始终为人们津津乐道。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盘点中俄文字之交,长诗译本已经超过十种,有诗人的译笔,更多是学人的译作,而且无不呕心沥血,译出了自己的特色,译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于是,这部别开生面的诗体小说,成了俄国文化在中国的象征,拉近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在有人来研究洋洋大观的译作,想看一看两种文化间的思想沟通得如何,艺术沟通得如何,取得了什么经验,还有什么不足,最重要的是交流本身包含着怎样的道理,这难道不是一个中俄文化交流的课题吗?从文化传播到接受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是一个新鲜的声音。

作翻译批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拿什么尺度去衡量译作,凭什么说译得好或欠佳,凭什么断定甲译本优于乙译本,或者说甲乙各有千秋。在这个翻译标准的问题上,本书作者走了迂回路线。她没有展开来正面缕述和评价已有的成说,却从研究视角和方法入手,选定“综合的文本分析”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这种文本分析实际上对译笔的得失、强弱、高下作出了判断。不过,有两个出发点在这里还是清清楚楚的:一是主张翻译应忠实

原著,二是认为译法总是多样的而无法定于一尊。那么,“综合的文本分析”是怎样实现了不同译本的比较和评价的呢?

作者明确地说是“利用文化符号学和交际理论”。俄国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洛特曼力主以文本为研究中心,而考察文本又以文本内在结构为中心。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便呈现为多层次、多成分、有组织、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交际理论的基本理念之一,则是雅科布森首创而为后人发挥了的交际六要素模式,其特点是关注文本在交际机制中的外部联系。把两方面综合起来进行文本分析,既要探究文本结构内的成分和层次,又要追寻文本同其他交际要素的互相制约,如此条分缕析地把译文同原著相比较,找出和与不和的得失,再拿不同译本相比较,找出多样中的个性和工拙。文本研究到此并未结束,作者又在条分缕析之后,综合微观所得,梳理出几个方面作宏观的概括,如作者形象、文化蕴含、格律移植等。宏观层面同样是在原著和译作之间、译作和译作之间权衡整体把握的功力和效果。

从实际的操作看,综合的文本分析这条品评译作的路子,是有效可行的,不失为突破翻译批评困境的一种方法。我总觉得,翻译的理论须是由翻译实践中导引提升而来的,不应是从概念到概念推断出的命题。我还以为,在今天人文科学思想日新月异的形势下,翻译理论的发展只能走与众多相关学科互动互补之路,闭门造车是没有前途的。本书作者所用的文本分析法,体现了从文本实际译法的考察出发,据此归纳立论的思路;同时也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依托符号学、交际论、文艺学、修辞学、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成果。我想,倘若汲取另一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会在译本分析中得到另一些有价值的发现。文本,尤其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精神产品,这复杂性一定会带到翻译运作中去,观察翻译时怎么可以把这复杂情形全抛到一边,视而不见呢?前面说到的翻译批评的困境,是否应该说正是学科自我封闭的结果?至少从此书看来,跨学科的研究是有广阔天地的,书中不少地方还留给人意犹未尽的遗憾。

综合的文本分析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感,恐怕还有一层更深的原由。近百年里随着译事的普及,人们为翻译立的标准也层出不穷,国内国外莫不如此。大致说来,早期侧重在给译者立个宏观的原则的目标——译文应该是怎样的。渐渐推敲得细致了,标准也就往实在里变,求其容易把握。后来相关的学问越分越细,对译笔的要求改从某个局部着眼,越来越具体,便由宏观演变成为微观。其实在翻译家眼里,选定一种原则性的标准就足够了,落笔时能做到匠心独运,则根本不需什么微观的条条框框。研究者却不同,还得关心这个原则性标准应如何分解和体现在译文的方方面面。国内的情形又有些自己的特点。试想,本书归纳出的中国翻译观(第一章第三节)——信达雅与无成规、神似与化境、优势竞赛等,无一不是宏观的原则,又无一不表示一种主观的倾向和期望,无法也不需化作可操作的规则。可另一方面,像国外那样从语言学、文学理论、修辞学等生发出来的具体微观的翻译标准,却不大为我们重视,好像近乎雕虫小技,无关宏旨。事情很明显,提纲挈领的宏观原则当然需要,它是统领译笔的主心骨,而微观的译法研究也轻视不得,那是学理深化的必然趋向。譬如作者提出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译诗中辞象传达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诗人的情感立场和风格特色应该如何把握?俄文诗的句法和用词习惯需要怎样处理?俄语诗律的节奏、用韵、诗节如何移植或变化?我们若全都不加细究,一味侈谈信达雅,标榜神似,陶醉化境,对翻译事业又有多大的益处呢?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把综合与分析统一起来,把我们的传统与国外的新潮贯通起来,尽管这里做得还不完全到位,但这种取向和努力无疑是富有创意的。

写到这里,我脑海里跳出一个掷地有声的字眼,盘旋不去,这便是任重道远。俄诗汉译的这种研究,如果照跨学科的路子走下去,如果立下目标开拓中俄文化对话的成功个例,那便有可能发展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创造,意义会是十分深远的。产生类似的遐想,记得还是初次看完作者这份文稿的时候。五年

过去了,现在重又思考行将付印的书稿,过去的期盼不仅没觉着失之夸张,反倒俨然带上了一些现实的印记。国内研究者对中俄诗学比较的兴致日增且不说,近年在俄国,几代同堂的汉学家在广泛开展汉诗俄译的同时,也开始做学术的反思,总结多年来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经验,学理的探讨和文化视角的观照,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可见,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往和了解,也将在人文科学中酝酿出一种对话的潮流。能在其中做个弄潮儿,该是多么幸运啊。

作者就是个幸运者,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发出了新鲜的声音。我期待着作者后续的更引人入胜的研究。

白春仁

2008年1月15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运用翻译学、语言学、文艺学、文化符号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以文本分析为中心，选择《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九个汉译本为对象，从文本分析与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汉译回顾、文本结构层次分析与文学翻译、格律（声调系统）的探索与转换、文本的文化内涵与传译途径、作者形象的体现和传达、译者个性与《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本的总体特色与未完的思考等八个方面探讨小说的汉译经验。强调文本研究是文学翻译的根本，重视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从文本研究和对比分析出发，为文学翻译实践的探索与研究、翻译鉴赏和批评搭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实际操作体系。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	1
第一节 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脉络	1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	6
第三节 国内文学翻译理念的发展	10
第四节 利用文学文本的研究理论,充实翻译研究的 理论基础	13
第五节 研究视角的定位——多维视角的文本分析	21
第二章 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	24
第一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构思和创作意图	25
第二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基本思想和各章的 主题	30
第三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要艺术特色	35
第四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地位和影响	38
第五节 《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	42
第三章 辞章、形象(意象)与汉译	47
第一节 《奥涅金》文本结构简析	47
第二节 文学传译的核心——从辞象到意象	48
第三节 关于翻译单位	51
第四节 中心意象的传达	54
第五节 意象传达的几个难点	82

第四章 格律的探索与转换	92
第一节 格律——诗章结构的特征性要素	92
第二节 “奥涅金诗节”及其汉译	94
第三节 节奏的不同处理原则及其审美效果	102
第四节 韵脚的不同处理原则及其审美效果	111
第五章 文化内涵的传译	125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25
第二节 译本的文化内涵传递途径	127
第三节 文化耗损	143
第四节 翻译呼唤自觉的文化立场	161
第六章 作者形象在汉译本中的传达	165
第一节 《奥涅金》中的作者形象	165
第二节 作者对语言艺术的态度	169
第三节 作者对艺术现实的态度——情调的传达	207
第七章 译者个性与《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	226
第一节 译者的角色与责任	227
第二节 译者的个性表现与类型	230
第三节 从译者个性看译者的选词用句风格	234
第八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汉译本的总体特色与 未完的思考	250
参考书目	264
后记	273

第一章 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视角

20 世纪末以来,世界不断走向多极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多元交汇成了必然的趋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争鸣,相互吸纳,世界文化出现了“多声”与“对话”的现象。这里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翻译活动空前活跃,德国翻译理论家冉佩尔特(P. W. Jampelt)称 20 世纪为“翻译的时代”。翻译事业的繁荣大大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新发展,一方面,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诗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学科都争相把翻译研究纳入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翻译理论研究又借助上述学科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手段,“从各个边缘的、相交的领域入手来扩大并确立自己的研究范畴”^①。文学翻译以其独特的性质自然成为这一时期颇为壮观的文化互动现象,大批的新作品被翻译,大批的经典作品被复译或变译,文学翻译的原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一节 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脉络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文学活动,又是一项思想文化活动。文学翻译的对象、观念、标准、方法和目的深受上述学科发展的影响和推动。重视理论概括,不断提出新的视点和模式,是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特点之一。进入 20 世纪,主要是“二战”以后,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翻译研究内部形成了依附语言学、

^① 许钧:《当代法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 页。

文艺学、诗学、阐释理论、文化理论、符号学等众多学科的不同倾向,它们从各自的角度剖析翻译问题,企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西方翻译史上关于文学翻译历来就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理论。一种是从古代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公元354—430)一直到20世纪结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为后来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翻译的语言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语言学家们看来,翻译主要应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翻译理论应该和语义、语法的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着眼点主要在翻译的过程。他们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的对等”^①。1953年,费道罗夫(А. В. Фёдоров)的《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问世。该书“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了较系统、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求得解决,因为任何体裁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于语言的对比”^②,同时提出了等值翻译的理论。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翻译科学探索》)、纽马克(Peter Newmark,《翻译问题探索》)、雅科布森(Р. Якобсон,《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等运用语言交际理论和社会符号学研究翻译;威尔斯(《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从话语语言学角度探索翻译;卡特福德(J. Catford,《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语言与翻译》)等的描写语言学译论,都是从语言学角度解决翻译问题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另一种是以文艺学为基础的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从泰伦斯

① 转引自谭载喜:《翻译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② 转引自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等古代戏剧家一直延伸到当代翻译理论家,如列维(捷克)、加切奇拉泽(苏联)、萨沃里(英国)、梅肖尼克(法国)等。这一学派的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20世纪中期再度兴盛的。1959年,雅科布森发表了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文中雅氏对意大利谚语“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即叛逆)的英译分析以及就此提出的问题,对文艺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文艺翻译学派的真正代表人物是苏联的加切奇拉泽(Г.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1979年,加氏在他的代表作《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①(《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中提出,“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文艺创作的形式之一,因此在文艺翻译中,“必须坚持创造性原则”。加入这支翻译研究队伍的还有萨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托尔曼(Herbert Cushing Tolman)。文艺学翻译理论的着眼点是研究翻译的结果,特别是比较原文和译文的主题结构、风格特色和艺术效果,与此相关还注重语言的创造力。按照这一派学者的观点,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的着眼点是进行再创作,文学作品的文艺性是翻译研究关注的焦点。理论家们还强调尊重译语文化,讲究译文的风度和文学性。

显然,研究角度与方法的不同必然导致认识上的差别:语言学派主要研究不同语言的对比规律,试图根据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总结出文学翻译的基本规律;文艺学派则参照文学理论,着重探讨原作与译文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企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揭示文学翻译的特点。实际的情况是,随着各相关学科的不断发 展,随着人们对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加深,传统两派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地固守着自己的一方领土,而是在

^① 主要内容参见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页。

不断的争论和探讨中,逐渐走向融合。

到了 20 世纪,文化学、社会语言学、符号学、交际理论等学科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研究。1957 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罗伯特·拉多(Robert Lado)的《跨文化语言学》(《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促进了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文化转向。到了 70 年代,当代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上升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将交际理论和文化视角用于翻译研究当中,翻译即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跨文化翻译学派应运而生。这一学派普遍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具体地讲,就是要看看哪些文化因素影响和制约了翻译,译者怎样克服文化的障碍,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进而探究各类文本中的文化因素怎样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同时要考察由于文化因素而引起的翻译问题。我国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微观的研究文化与翻译的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翻译研究进入了文化热的时期。丹尼尔·肖(R. Daniel Shaw)明确指出:“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①20 世纪里,符号学翻译论也异军突起。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雅科布森、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研究不仅为语言学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同时也给翻译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翻译的根本是语言活动,但是单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是不够的。皮尔士全面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和研究范围,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并给予它们相等的认识论地位。这非常有利于翻译理论在继续肯定翻译是语言或言语活动的同时,去开拓语言以外即超语言因素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翻译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另外,符号学与翻译论具有共通性,两者都

① 转引自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2 页。

关注语言文本或信息,即语言符号的用法、解释和操作。

雅科布森对翻译与符号学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他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把翻译完全置于符号学的框架内进行考察,并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问题。有研究者认为,70年代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的《语言与翻译》,就运用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D·L·戈雷(Dinda G. Gorlee)出版于1994年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C·S·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符号学翻译专著,该书从符号学的角度探讨了目的语与原语的对等、翻译过程和它的阶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等三个问题,颇多新意。

此外,还应该指出,从60年代末70年初起,西方翻译界活跃着另一批专家学者。他们试图打破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禁锢,以区别于传统研究的方法,在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他们的研究“不仅对西方翻译学界,而且对整个国际翻译学界,具有革命性的、划时代的意义”^①。他们中有美国诗人、翻译家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英国翻译理论家、诗人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这些专家虽未标榜自己是什么派别,相互间却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那就是把文学理解为一个综合体,一个动态的体系,亦即把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由各种因素按一定的规则严格构建而成的组合体。他们主要探讨译语文本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语文本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国内对此尚不很了解,有的研究者称之为“翻译研究派”,有的学者认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文艺学派”,有的学者则将他们归入文化翻译理论。

翻译理论深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新批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的研究者也都不约而同地从自己的角度给翻译研究以关注,有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的把翻译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联系起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构不成真正的翻译学派别,但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西方文学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多层面交叉。

总体说来,翻译研究(也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甚至首先是文学翻译)在今天呈现多元互动的局面是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确定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是当今进行翻译研究的首要前提。

第二节 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

翻译不仅是一项格外复杂的跨语言的信码转换活动,更是一项意义深刻的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向人们提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难怪有人说,“翻译历来是是非之地”(王佐良),有人干脆称翻译学为无所不包的“杂学”。文学翻译更不同于其他语体如科技、公文事务语体的翻译,它兼有一般翻译的普遍性,又有着比其他语体翻译复杂得多的特殊性。不难发现,不同倾向的理论研究正是在文学翻译上互相沟通,互相求助,引发更为激烈的讨论。我们认为,对任何一种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基本概念必须明确,这样,一切围绕理论的讨论和争议才有了共同的出发点。面对如此多元复杂的学理,我们觉得还是该应该由翻译实践出发,明确一些基本的、核心的概念,根据要解决的问题去选择理论的走向。

归纳起来,问题的根本无外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是科学、艺术还是技能?

判定一个能准确界定翻译的术语:是科学、艺术还是技能,花去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就是科学,他们的理论也被称为翻译科学论。文艺学派则一直强调翻译是艺术,是创造的艺术。雅科布森把翻译定义为“一种技能”,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是技巧”,奈达的翻译思想则体现了把翻译看作“科学—艺术—技艺”的过程。巴斯奈特认为,每一种术语的选择都从一定角度反映出不同学派对翻译的

不同评价体系,这种争论的结果只能使翻译研究脱离正题,达不到系统、科学地研究翻译的目的。

2. 译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反映的是人们如何认识翻译的忠实原则。从翻译活动诞生至今,“忠实”的问题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忠实是翻译家们、各理论学派共同追求的目标。翻译家在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时,都表明自己如何担心不能忠实于原作,理论家的字里行间无不显示着自己追求的忠实的目标。如果说翻译活动中还有普遍公理的话,那就是“忠实原作”了,不然的话,翻译将不成其为翻译。显然,矛盾的复杂性全在于“忠实什么”即“译什么”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既要忠实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形式),又要忠实于原文的深层结构(内容);有人认为,翻译只要求尽可能传达出原文的深层结构(内容);也有人认为,忠实的传达是以深层结构为主,表层结构为辅。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诗歌翻译,追求形式的近似往往不亚于内容的近似,如此等等。除此而外,翻译建立在译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上,而一切文学作品对读者而言都是变数,是个开放性的符号系统。所以,“忠实什么”的问题从翻译的最初就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永远不能完满说透的。译者只能停留在忠实的“千万级台阶上的一级”(树才),这样一来,“译什么”的问题就留有很大的争论空间了。语言学派对原文与译文所包容的语言信息特别感兴趣:关注词汇意义的对应和语法关系的对应,认为语言信息不得随着形式的改变而有任何歪曲;文艺学派强调译文的艺术效果,重视作品具有的美学功能;文化翻译学派坚持翻译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之中,译文应该在文化功能、文化信息上与原文等值;符号学不仅注重文本的整体性,还关注文本以外的东西: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文本的语境、文本信息的传递途径等等。

3. 怎么译的问题

怎么译的问题是关于翻译的原则与策略的问题。每种学派对“译什么”的理解各不相同,因而采取的翻译原则与策略也大